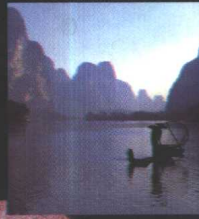


新世纪的发展挑战



2020 年的中国



世界银行

2020 年的中国：
新世纪的发展挑战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Copyright © 1997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1818 H Street, N. W.

Washington, D. C. 20433,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rst printing September 1997

世界银行不保证本书数据的准确性，也不对引用这些数据导致的任何后果承担任何责任。本书的任一幅地图中显示的疆界、颜色、名称及其他信息不代表世界银行集团对任何领土的法律地位的判断或对该疆界的认同或接受。

本出版物的资料已经版权登记。希望复制本书内容的申请，应按上述版权声明所示地址，向世界银行出版办公室（Office of Publisher）提出。世界银行鼓励传播其出版物，通常会立即给予许可，对于非商业目的的复制不收取费用。复制本书部分章节用于课堂教学的许可证由美国的版权许可中心签发，地址：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Inc. Suite 910, 222 Rosewood Drive, Danvers, Massachusetts 01923, U.S.A.

封面照片摄影：Dennis Cox / China Stock.

封面插图（从左至右）：Vince Streano / Aristock Inc; Claus Meyer / Black Star; Serge Attal / Gamma Liaison; Dennis Cox / China Stock; Joe Carini / Pacific Stock; Erica Lansner / Black Star.

ISBN: 0-8213-404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 /（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
编写组编；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组织翻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9

书名原文：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ISBN 7-5005-3600-3

I. 20… II. ① 20… ② 世… III. 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F1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9141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邮政编码：100010

北京胶印厂印刷

889×1194 毫米 16 开 11 印张 307 000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ISBN 7-5005-3600-3 / F·3310

图字 01-97-1239 号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致 谢

本报告由Vikram Nehru带领的小组撰写。该小组成员有Art Kraay 和于小庆。小组咨询专家有 Athar Hussain 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 Barry Naughton 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该小组还得到暑期实习生 Jean Imbs 和 David Ng 的协助。报告评论者有 Dwight Perkins 教授（哈佛大学），Gregory Chow 教授（普林斯顿大学），Homi Kharas, Gene Tidrick, 和 Peter Harrold。项目助理是 Janet Wyse。

课题小组对Nicholas Hope先生（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表示特别感谢，感谢他对本研究的构想以及不懈的支持。小组感谢对研究作出贡献的以下世界银行成员，他们是：Halsey Beemer, Natasha Beschorner, Eduard Gos, Pieter Bottelier, Tilly Chang, Dipk Dasgupta, Yuri Dikhanov, Sandra Erb, Jorsep Goldberg, Daniel Guanaratnam, Bert Hofman, Hanet Hohnen, Shikh Hossain, Gordon Hughes, E.C.Hwa, Todd Johnson, Bert Keidel, Kathie Krumm, Anjali Kumar, Nathalie Lichtenstein,

Feng Liu, Kseniya Lvovsky, Tamar Manuelyan-Atinc, Will Martin, Andrew Mason, Hena Mukherjee, Richard Newfarmer, Al Nyberg, Alan Piazza, Klaus Rohland, Helen Saxenian, Lyn Squire, Lee Travers, Jagdish Upadhyay, Machael Waktibm Shahid Yusuf.

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及学术界人士慷慨地提供了时间和知识，世界银行课题小组与他们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从中获益。小组特别感谢：祝宪、丁先觉、杜俭、潘晓江、王征、吴晋康、王卫星、梁树春、史耀斌（财政部）；郑新立、曹玉书、戴桂英、刘鹤、王锡多、杨庆蔚、姚鸿、赵世洪、王建军、吴强、卢嘉祥、宁吉喆、于鹏、马晓河、李云林、胡春力、徐林（国家计委）；王大用、景学成、谢平、杨再平、姚克平、裴传智、赵险峰、陈新、杨辉生、郑耀东（中国人民银行）；王子先、朱智屏、陈星、唐伟、刘亚军、王毅、邓立、张力勇、刘天民、邹晓明、李健（外经贸部）；王慧炯、李泊溪、李善同、丁宁宁、赵晋平、葛延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克平、王海军、邓先宏、郭向军、蒋晓云、邓然、陈玉宇（国家体改委）；明瑞峰、王亚东、刘丹华、劳玉军、李征宇、吕玉林、李京虎（劳动部）；宋毓钟、卫东、秦永法、王旭、刘东升、周双虎（国家经贸委）；宋延明（内贸部）；马林、郑华、靳东升（国家税务总局）；冯菊平、黄洪博（国家外汇管理局）；刘北华（农业部）；宣增培（国家科委）；叶震、郑京平（国家统计局）；过孝民、肖学智（国家环保局）；刘培龙（卫生部）；孙玲（国家教委）；汪东

虹（海关总署）；迟建新（国家开发银行）；王洛林、张卓元、杨圣明、裴长洪、王振中、汪同三、李杨、吕政、韩俊、江小涓、陈振声、赵京兴、余永定、张宇燕、余德昌、徐更生、郑易生、李成贵、董易生（中国社科院）；樊纲（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胡鞍纲（中国科学院）；王传纶、陶湘（人民大学）；易纲（北京大学）；施祖林（清华大学）；沈联涛、杨宜达、黄学元、林寿康（香港金融管理局）。课题小组还受益于参加国家计委 1997 年 3 月 19-21 日在北海举办的“中国奔向 2020”研讨会的代表进行的讨论。

课题小组感谢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慷慨资助由胡鞍纲（中国科学院）、蔡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和国家科委准备的三个材料。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刘都生帮助协调并提供了后勤便利，财政部世界银行司梅鸿、范文仲、潘文星负责协调中国政府机构和学术单位的活动安排。

Rupert Pennant Rea 对本报告进行编辑。Bonita Brindley 提供了编辑指导。美国 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公司 Writing 部门的 Meta de Coquereumont、Paul Holtz 以及 Glenn Grath 负责制作和排版。Kim Bieler 进行设计。Carol Rosen 在出版局负责本报告。

李笑薇、李量和张积豪在中文版的校订中提供了帮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童映华为中文版做了文字加工润色。中文稿在修改过程中还得到了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张岚松、吴巧娥的帮助。

目 录

致 谢	(VII)
摘 要	(1)
第一章 了解现在	(5)
快速增长	(6)
高储蓄	(9)
结构变革	(10)
务实和渐进的改革	(12)
初始的状况	(15)
第二章 预卜未来	(19)
增长的挑战	(20)
增长的可能性	(21)
第三章 奠定基础	(25)
恢复和改革政府财政	(26)
为市场运行腾出空间	(30)
使市场更好地运作	(36)

第四章	形成相互竞争而又充满关怀的社会	(43)
	使用劳动力市场具有灵活性	(44)
	保护弱者	(50)
第五章	养活人民	(61)
	消除国内生产的制约因素	(62)
	预测粮食差额	(66)
	利用国际贸易	(67)
第六章	保护环境	(71)
	环境状况不断恶化	(72)
	关于污染的前景	(73)
	制订政策争取更清洁的未来	(74)
第七章	与世界经济一体化	(83)
	深化贸易一体化	(84)
	深化金融的一体化	(90)
	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92)
第八章	设定议程	(97)
	2020年的两种情景	(98)
	中国迈向2020年的议程	(99)
	世界与中国	(103)
	结论	(104)
附件一	中国增长的原因	(105)
附件二	制作增长和结构变革模型的方法	(109)
附件三	预测贫困和不平等	(115)
统计附录		(119)

本报告所用“香港”一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迄今为止这两个转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自1978年以来，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多。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发展。

然而快速增长和结构变化在解决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不完全改革引起的时而出现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就业得不到保证；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社会不公平增加；难以削减的贫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它们将会削弱持续增长，从而使中国的前景黯淡。

本报告认为中国有能力应付这些挑战

并保持快速增长。虽然面临的困难不可低估，中国的力量也同样不可低估——引人注目的高储蓄率，务实改革的业绩，相对稳定、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海外华人的支持以及不断增强的管理能力。这些力量在本世纪最后的20年中推动了中国的增长，并将在下世纪的前20年发挥同样的作用。

但是要培养并有效地利用这些力量，中国的改革必须从三个相关方面展开。第一，鼓励开拓市场力量，特别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粮食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自然资源价格改革；第二，将政府的职能转向建立快速发展经济所需的法律、社会、物质及体制基础，为市场服务；第三，通过进一步降低进口贸易壁垒，增加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以及逐步与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深化与国际经济一体化。

二十一世纪发展的挑战

中国会在未来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吗？未必。未来有利的推动力量和目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是一样的：良好的改革记录、持续的结构变化范围、很高的储蓄率、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富有而又支持中国的海外华人，以及一个适宜的世界经济环境。但是与此相对立的则是一组由于中国的快速增长和结构改变所带来的难以对付的挑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它们将可能会损害中国未来的增长，并且给中国的未来投上阴影。

为市场经济打下牢固的基础。中国正处于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中途。在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分界线都是模糊的。这会导致政府内部的利益冲突，并最终损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分离政府和市场，澄清它们各自的作用和责任，将有助于建立实现快速持续增长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的基础。

建立一个既有竞争又充满关怀的社会。中国将在市场力量引入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随着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一些风险，特别是就业和收入的风险也在增加。在未来的25年里，两亿农民将离开农业生产领域在非农业部门寻找更好的工作，从农村流入城市。与此同时，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相对平衡的变动，将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发生强烈的冲击。在这一混乱的变化时期，社会中的弱者有被落在后边的危险，这会导致社会财富不平等的增加，加剧社会压力。社会中面临风险的主要群体是穷人、病人、老年人、妇女和失业者。

确保粮食的适量供给。在中国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中，粮食保障居于众多优先项目的首位。这种担心部分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必须要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意味着中国将必须用仅占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另一个办法是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市场。中国的决策者们担心这将使中国过分依赖国际粮食市场。况且，由于中国在世界粮食的生产和消费上占有很大的比例，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净水平的变动将影响世界

谷物进出口商。

保护环境。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使中国加入了世界上空气污染和水质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列。环境污染给人和经济造成的代价巨大。如果中国空气污染的程度下降到政府规定的标准，则每年可以减少289,000人的死亡。从总体上看，中国每年污染的经济损失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将来，如果不改善人们生存的物质环境，实现中国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也只是空洞的胜利。

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对于中国的未来增长来说，外贸、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尽管中国已经作出承诺要进一步放开贸易，但政府同样认识到，要对国内的产业和银行进行调整的成本也是高昂的。中国的国际一体化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贸易伙伴将从向中国这个巨大而大部分尚未开发的市场出口商品中获益。不断加强的贸易联系将带来广泛的益处，这正如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是否能继续保持开放。

二十一世纪的政策

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政府需要提出全面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到相互关联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鼓励开拓市场力量，特别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而进行；第二、通过减少进口壁垒，增加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以及逐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来深化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第三、将政府的职能转向建立经济中的法律、社会、物质及体制基础，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市场的扩大与深化。在中国所有的改革中，最迫切、最重要的是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从政府中分离出去。政府决定重点发展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而放松对其余314,000家企业的控制，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任重而道远。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完全参与国内、国际的竞争。与其同样重要的是，企业的所有权应多元化，并向私人或非国营机构所有的形式发展。

各级政府也应该停止干预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银行在向国有企业贷款时，也应象对待其他借款人那样进行周密的调查，并采取同样的防范措施。银行必须建立起信息管理、风险评估、信用等级分析以及坏帐准备等一系列制度。政府可以通过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和鼓励竞争（最初是国内银行间的竞争，最终容许外资银行参与竞争）来刺激这种转变。

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城市，改革意味着社会保障应与在国有企业就业脱钩。就业机会的信息增加、为下岗的人员提供更好的再培训机会，将有助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平衡。而且，逐步取消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将有助于贫困人口找到收入较多的工作。

市场同样能够在经济中各分部门得到深化。例如，在农业部门，政府目标是逐步将政府收购粮食占全部上市粮食的比例从现在的 75% 减少到 2020 年的 25%，为零售和批发市场的发展留下空间。同样，政府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标，政府可以逐步引入煤炭税、提高汽油和柴油税、以及空气和水的污染费。最后，在工业部门，政府应该摒弃资助某个行业的做法，而是发展强有力的竞争和技术政策，以奖励创新、承担风险和良好的管理。

与世界经济一体化

为加速贸易—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政府需要制定一个确定的时间表来减少贸易限制，使之达到国际接受的水平。中国政府认识到进口自由化将会带来短期的损失，因为公司需要通过解雇职工和更新设备来与进口品竞争。不幸的是，这些企业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对生产规模很敏感，并且大多集中在失业率已经很高的地区。但是，未来的困难不应阻止政府现在就采取行动。在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要适应于这种贸易自由化所需做出的调整很快就可以完成，而损失也能被控制得比较低。再者，无论短期的代价有多大，它们远不及一个开放、灵活、竞争的经济所带来的长期效

益。

在进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不应忽视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融合。事实上，市场正使中国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巨额私人资本大量流入和流出中国，有时甚至通过非法途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使高速增长受到资本流动所能产生的不稳定的影响。全面考虑金融融合带来的利益和风险，谨慎进行资本帐户自由化显然是明智的办法。

重新引导政府使其更有效。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作用的减弱，以及市场和贸易的作用的逐渐增大，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在下降。恰恰相反，这表明了角色的转变，政府的功能将转变为提供关键的服务和建立有效的结构。

重新分配政府开支。政府应当把力量集中于向社会提供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本报告列举了一些政府在制定预算时应予以关注的领域。这些领域是：

- 追加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以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学杂费负担，并保证女孩（特别是农村女孩）受教育的权力；到 2000 年实现政府提出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扩大高等教育以满足中国对专门的管理人才和熟练的技术工人的需求。
- 加大对农业研究的投入以促进粮食增产增收。
- 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如：防洪、灌溉、天然气管道建设、公共交通、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以及农村道路（特别是在内陆省份）。
- 加大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使农村贫困人口成为医疗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将重点放在免疫、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其它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上，防止工伤和车祸。
- 保护穷人和老人。对穷人，除了重视他们的基本健康和教育外，也应协助他们在邻近发展较快的省份找到工作；对老人，政府应资助完成从现收现付的退休工资制向三个支柱的养老金体制的转变。

在上述这些优先领域，政府投资的缺口据估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6%。这还只是一个保守数字，因为它没有包括支持未来经济改革所需追加的投入——例如支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费用、支付货币化的住房福利、支付金融体制改革所需的成本。如果要想靠提高税收来支付这些开支，政府必须在税收上有很大的改善。即使可以做到这点，中国税

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制度建设。政府对经济决策的直接控制必须逐步被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发展所替代。法律体制运行不好是由于没有有效地执行法律。这就意味着应该发展法律专业人员队伍，加强法制教育。

腐败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虽然政府已经迅速行动着手控制它，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去做。对腐败行为（包括行贿人）提起诉讼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此外，中国必须削减官员们可以滥用的职权，增加公共开支的透明度，建立一个诚实、有能力的公务员队伍，从而减少腐败行为的动因。

透明的、反应灵敏的体制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十分重要。政府预算应该包括许多目前属于预算外的开支，并交给公众讨论。政府机构的开支应限定在一个明确的范围内——超出了这个范围，这些机构就应为他们的失误负责。

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体制也同样至关重要。改革的重心是提高中央银行管理金融状况的能力。另

一个重心是中央银行对其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金融体制改革总会带来一个危险，即银行的风险性活动可能会引发全局性震动。其他国家银行倒闭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银行经营的失败经常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很大的损失。中国经受不起这种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他行驶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急流险滩中。

总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从未取得过的发展。未来的二十年可望取得同样的成就。中国面临的巨大风险可能使希望蒙上阴影。但是有国内坚定的领导和世界工业强国具有大国风度的政策，中国将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将有机会摆脱贫穷和落后的羁绊，实现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经济转型。

*二者中较小的数字是中国学者使用未能得到的工资收入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的计算结果。许多西方学者使用人们为避免生命危险而愿意支付的数目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使用这后一种计算方法将得到文中较大的数字。

了解现在

中国正处于两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之中：即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之大、过去对城市化的控制以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速度的话，第一个转型还不会引人注目。中国的人口远远超过了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和，而其工业增长几乎是这些国家增长的十倍。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独一无二的，她通过试验和渐进改革相结合的方式，促使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展迅速，而另一些领域则进展缓慢。

这两种转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激发了快速增长。在过去1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了四倍多。在1978到1995年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8%的速度飞快增长，使2亿中国人告别了绝对贫困。¹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推进了中国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保持了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基本实现了农业耕作的私营化，放开了许多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加强了工业内部的竞争，并引进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

与此同时，这两种转型的合力，产生了强大的漩涡和逆流，它们可能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单是指令向市场的转型就是变幻莫测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

和东欧的经济崩溃。同样，从乡村型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许多风险。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中，这一转型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到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

因此，中国的快速增长和结构变革在解决了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新的难题是毫不奇怪的。这些新难题有：由于尚未完成的改革所造成的宏观经济不稳定阶段；就业和收入无保障状况的增加；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日益增大的环境压力；粮食自足成本的不断上升；不平等日益严重和根深蒂固的贫困；以及棘手、有时是敌对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严峻的挑战，如果不加以解决，它们就会破坏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中国的前途也可能会黯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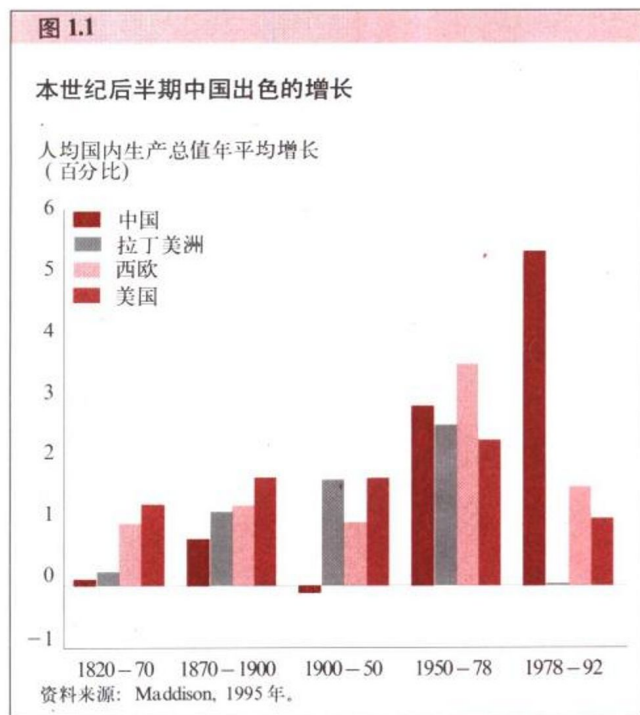
但本报告认为，中国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尽管面临的困难不容低估，但同样不应低估的是中国的长处——局势相对稳定，相当高的储蓄率，务实改革的巨大成绩，散居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和日益增强的行政能力。是这些长处推动着本世纪最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它们同样是下个世纪头二十年里快速持续增长所必需的。为提高中国成功的可能性，需要另外三个因素对这些长处加以补充，这三个因素是：精明的经济管理，世界经济的支持和国内的社会稳定。

快速增长

衡量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件棘手的事（专栏 1.1）²。官方统计表明，在 1978—1995 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了 8%，而其他估计数字则要低 1—2 个百分点。但是，不论这些数字中哪个数字更准确，中国的增长都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速度可以与之相匹敌。

中国自 1978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从历史观点看也是很显著的（图 1.1）。19 世纪和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不能更令人失望了。在 1820—1870 年间生活水平未获得任何改善，在随后的 30 年中也仅是稍有增长。³ 在动荡不安的本世纪前半叶，人均收入实际上下降了，在这期间，中国在 3000 年历史的世袭帝制瓦解之后，又渡过了一段

无政府主义和军阀混战时期，才从外辱和内乱中幸存下来。而这时期，世界其它地区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仍获得了可观的增长。结果，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 1820 年高达 30%——当时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下降至 1950 年的几乎不到 7%。



自那以后，中国一直在进行一定的恢复。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相当大的经济混乱和浪费，但战后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经济增长还是有所恢复，到 1978 年，当中国尝试着朝改革迈出第一步时，它仍然是一个极为贫穷的乡村和农业经济国家。中国十亿人中有 60% 都靠着低于国际贫困标准的每天一美元的收入生活。

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农村改革的推行是使干枯的经济重新焕发活力的第一场及时雨，它推动了改变中国面貌的增长进程。接下去 17 年中的快速增长率使得中国人均收入每十年就翻了一番，这一速度比近代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要快（图 1.2）。⁴

中国的迅速增长有三个特征值得特别一提。首先是它的地区层面。尽管人们对地区差距的问题表示担心，但中国大若国家的各省经济都适当地分享

中国增长有多快？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78 至 1995 年间实际增长 8.0%。这个数字有可能夸大了中国的实绩。这是因为在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转换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时，官方使用的消费和投资减缩指数的增长要比消费物价指数或资本货物价格指数这些其它可以使用的指数增长慢得多，近几年尤其如此。如果这些替代指数是衡量价格上涨的更好的尺度，那么用它们来转换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出衡量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的更加精确的数值。

运用合理的替代办法来衡量价格上涨表明，人均收入的增长可能要比官方统计数字所表明的低 1.2 个百分点（见表）。两个估计值间的不一致，大多出现在改革的后半期（1986—1995 年）。

这些调整有什么意义呢？一方面，对国内生产总值测算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百分点的误差，从长期看会造成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很大误差。另一方面，即使考虑到中国数据的缺陷，中国的增长实绩仍然是十分可观的（见图），用任何标准衡量，中国都稳居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前十名之列。

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减缩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百分比）

	1978-95	1978-85	1986-95
使用官方减缩指数	8.0	7.8	7.9
使用替代减缩指数	6.8	7.4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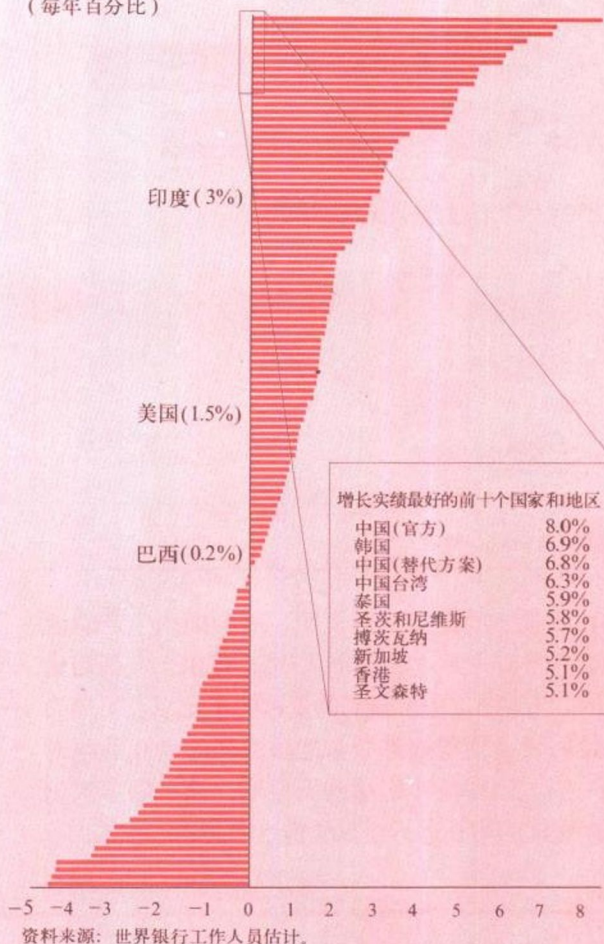
注：见本章注 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计。

1978-1994 年中国创记录的增长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78-94

（每年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计。

到了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虽然沿海各省的增长率较快，年均均为 9.7%，但非沿海各省也不太差。确实，如果将中国的 30 个省算作单独的经济体，那么，1978—1995 年间世界 20 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都会是中国的！

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增长明显的周期性。尽管中国改革后经济周期的上下波动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表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剧烈摇摆相比要小得多，但其幅度足以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图 1.3）。伴随这些增长周期的是通货膨胀率的类似波动，这反映出由于财政、企业和银行系统未完成的改革所引起的宏观经济管理上的失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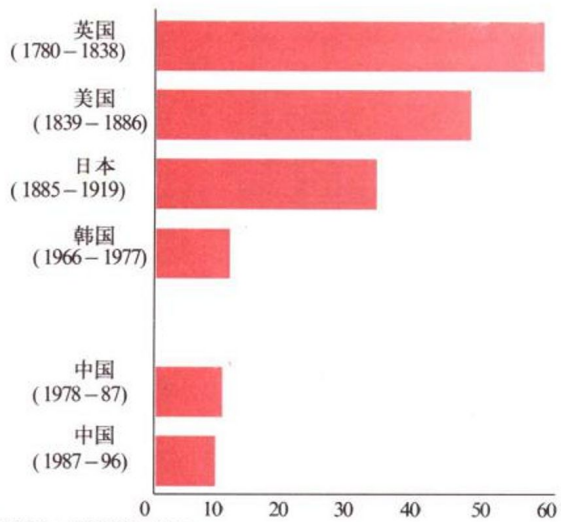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生产力的增长在这中间的决定作用。与其他迅速增长的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增长较少地依赖资本和劳力投入量的增加。以有形资本存量的增长为例（表 1.1）。在多数国家中，资本投入的增长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且幅度常常很大。⁵ 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这表明是资本积累以外的其他因素成为决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解释中国增长根源的常规方法表明，单单资本投入的增长只能对增长的 37% 做出解释（附件一）。另 17% 的增长则归功于劳动力数量的

图 1.2

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年数

人均收入翻番的年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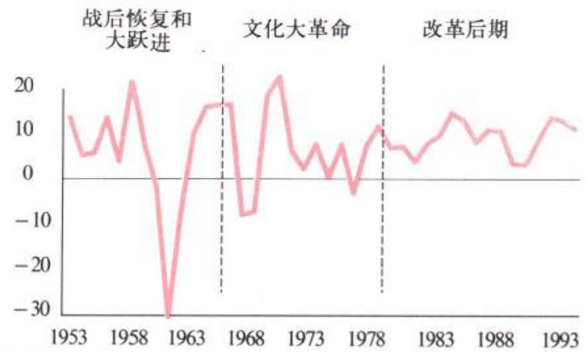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1991。

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这表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几乎有一半 (或每年 4.3%) 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专栏 1.1 中所谈到的资料的不足以及不同的方法论假设会使得这部分未能被解释的增长的绝对数小一些, 但即使作出这些调整后, 简单的事实仍然是, 中国的增长远不止仅凭借生产要素的积累。

图 1.3

中国经济增长的起伏

每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百分比)



资料来源: Chow, 1993 年; 世界银行, 1996

1987 年以来这一显著和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 有四个因素值得考虑:

- 高储蓄率支持了高水平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
- 经济结构变化, 它是增长的原因, 也是增长的结果。
- 务实的改革, 它非常适合中国的特色, 也受大众的支持。
- 中国 1978 年的经济状况特别有利于改革的推行。在此之前的指令经济之下, 中国的经济状况有如一片干枯的草原, 等待着中国特色的市场改革来滋润。

表 1.1
中国增长的原因
(每年百分比)

国家	时期	平均年增长				因部门重新分配所造成的增长	未说明的增长份额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有形资本	人力资本	劳动力		
中国	1978-95	9.4	8.8	2.7	2.4	1.5	29
对比国							
美国	1820-1913	4.1	5.5	1.6	2.8	缺	14
美国	1950-92	3.2	3.2	1.1	1.6	0.03	35
日本	1960-93	5.5	8.7	0.3	1.0	0.26	30
韩国	1960-93	8.6	12.5	3.5	2.4	0.34	21

注: 人力资本的定义是每个工人受教育的总年数。部门重新分配意味着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在中国, 这同样包括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移。关于方法, 资料来源和为中国官方数据所作的调整的全面说明见附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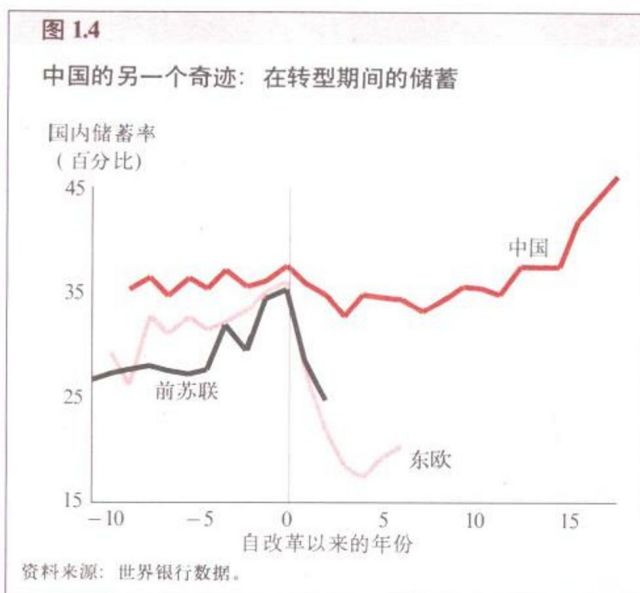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附件一。

下文依次对每个因素加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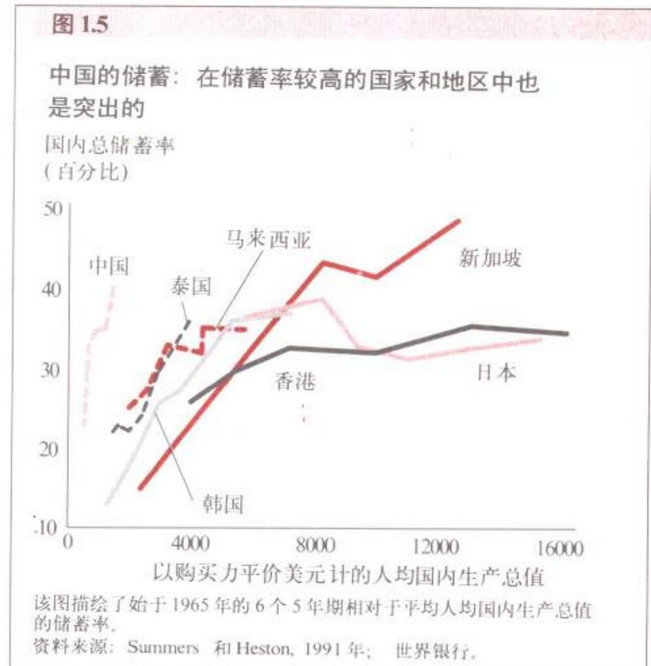
高储蓄

中国自 1978 年以来显著业绩的最突出特征是其储蓄率。它就像增长率一样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储蓄率在 1978—1995 年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7%，而较为保守的估计则要低 3—4 个百分点。⁶ 即使如此，这一比率仍然处于世界最高之列。

同样重要的是，储蓄率相当的稳定，即使是当改革和结构变革对经济进行重组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将此同东欧和前苏联转型经济国家的储蓄暴跌进行比较（图 1.4）。事实上，稳定的高储蓄率是中国人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取得的重大成功之一。



尽管中国的储蓄业绩使其有别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但却很接近于其他有活力的亚洲国家的模式。在这些国家经济起飞后不久，储蓄率都迅速上升，促进了高增长和高储蓄的良性循环。中国的情况很类似，但其极高的储蓄率是在很低的收入水平上完成的，使其即使在储蓄率较高的这一批国家和地区中也属例外（图 1.5）。



造成如此高储蓄率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中央计划经济之下，高储蓄率是靠计划带动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被人为地压得很低，而最终商品价格人为地抬得很高。这样，利润集中到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在中央和地方计划机构的指导下投资。这使得储蓄率在 1965 年至 1978 年间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3%，而投资的格局大大地有利于重工业。居民储蓄微不足道，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

但自 1978 年开始改革以来，企业和居民的作用颠倒过来了。自那以后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从改革前的 1% 左右猛增至 21%（图 1.6）。现在居民储蓄占全部储蓄的半数。

为什么中国家庭如此节俭呢？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不足以说明其原因。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收入的提高使得消费不再仅仅是为了糊口，人们对生活有了更高的期望。中国居民把目光放在了购买房子、公寓和一系列以前无法获得的耐用消费品，以及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上。为此而举债是不可能的，于是家家户户就代之以多多攒钱。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统计上的变化。⁷ 今天的平均预期寿命比 1970 年增加了 10 岁，并且还在

增加。一般的中国婴儿现在可望活到 70 岁以上。由于城市居民在 55 岁退休，他们有着为其退休而储蓄的强烈动机，尤其是当其知道养老金可能不够用时。同时，生育率的下降也减少了由子女供养老人这种传统形式的作用。

最后，体制的因素也有助于推动家庭储蓄。这其中有两个因素较突出：政府对在银行系统存款的隐含的担保；以及在中国刚刚起步的证券市场进行投资的新方式的增多。

结构变革

随着经济迅速增长而来的是快速的结构变革。在这方面，中国沿袭了与其他国家同样的道路，⁸ 所不同的只是变革的步伐：中国将通常要花几十年时间的过程压缩为几年。再看看就业的格局。从 1978 年以来的 18 年间，农业占劳动力的份额从 71% 下降至约 50%。而实现类似的结构转变美国用了 50 年，日本用了 60 年（图 1.7）。

“推出”和“拉入”两个因素加速了劳动力脱离农业的流动。务农的低收入和农村地区普遍的贫困，促使农民及其家庭另走他乡。⁹ 与此同时，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却激增——尤其是生产力迅速提高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脱离农业并不意味着大批移民流入城市。各城

市的人口份额只从 1978 年的 18% 增加到 1995 年的 28%（专栏 1.2）。但与改革前时期相比，这一城市化的速度是迅速的。从 1957 年至 1978 年，由于政府政策不鼓励城市化，城市人口比例只上升了 3 个百分点。

离开农业也促进了经济中所有制模式的转变，尤其是在工业中。第一次工业化浪潮出现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并且集中在国有企业。然而自 1978 年以来，国有企业增长较慢，因而其在总产出和就业人数中的份额迅速下降。第二次工业增长浪潮出现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乡镇企业。但在过去几年中，第三次工业化浪潮正在形成：主要是私有和个体企业，外加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¹⁰

无论如何，私有部门的规模比官方统计数字要大。许多私有企业有理由少报其生产和雇佣人数。此外，许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象私人企业一样运转，但却随处可以看见他们打着城镇或乡村企业的旗号在经营，这种做法被人称做“戴红帽子”。这也许有利于获得贷款和执照，而且避免了私人活动可能仍然有的不好的社会或政治名声。

结构变革的进程为中国过去 18 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由于很大一部分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随着劳动者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长。从 1978 年至 1995 年，这个进程可使国内生

